

· 上海政法学院学术文库 ·



由“尊德性”而“道问学”

学风转轨与清初孟学

杨 华 ·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由“尊德性”而“道问学”

学风转轨与清初孟学

杨 华·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由“尊德性”而“道问学”：学风转轨与清初孟学
/ 杨华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
ISBN 978 - 7 - 5520 - 0257 - 7

I. ①由… II. ①杨… III. ①儒家—研究—中国—清
前期 IV. ①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7420 号

由“尊德性”而“道问学”：学风转轨与清初孟学

作 者：杨 华

责任编辑：张晓栋

封面设计：闵 敏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13.5

插 页：2

字 数：242 千字

版 次：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520 - 0257 - 7/B · 083

定价：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导 言	1
一、清初学风转轨的孟学回响	1
二、学术史回顾与反思	6
第一章 反思理学与清初孟学研究	12
一、反思理学：清初孟学研究的学术语境	13
二、“经学附庸”与“义理阐发”：清初孟学研究的两种路径	26
三、由“尊德性”而“道问学”：清初孟学研究的学风趋向	36
第二章 理想与现实：清初孟学研究中的心性论	48
一、善恶之辨：清初人性善恶的新诠释	49
二、由内而外：清初人性论转变的倾向	62
三、弃虚蹈实：清初人性论折射的学风特点	73
第三章 自律与他律：清初孟学研究中的情欲论	81
一、直面与思考：清初学界对情欲的理解	82
二、践履与重礼：把握情欲正当性的两个面向	98
三、阳孟与阴荀：清初情欲论中的荀学因子	110
第四章 清初孟学研究中的荀学理路	120
一、重“学”与荀子的劝学思想	121
二、道德之“实”论与荀子的重礼思想	130
三、“以礼代理”：清初孟学研究中荀学理路的彰显	143

第五章 “道问学”的确立与流行：从戴震到焦循	154
一、继往开来：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	155
二、戴学精神的传承：知识与制度	171
三、戴学方法的流行：焦循的《孟子正义》	181
结 语	196
主要参考文献	201
后 记	207

导 言

一、清初学风转轨的孟学回响

20 世纪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的近代化历程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国的近代化过程有其深刻的内在自生因素,中国在近代化过程中的种种际遇都无法与中国传统社会和学术思想撇清干系。因此,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存在的“近代性”因子是探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不可或缺的一环。如果说清代社会承载着传统中国向近代转变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动因,那么深入探讨清代学术思想则无疑是研究传统学术思想近代转型的重要路径。清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承袭着明末悄然兴起的反思理学运动,其学风出现了深刻变化。如果说学风转变是社会转型在学术思想上的集中体现,那么探讨清初学风转轨就成为剖析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自发”转型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清代学风大异于宋明。理学重“尊德性”,清学则趋于“道问学”,由宋明而清的学风转轨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意义极为重大。《礼记·中庸》:“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尊德性”与“道问学”两语历千年,尤其是经过朱熹和陆九渊的“鹅湖之辩”,终于演化为中国传统思想中治学方法论的代名词。从某种意义上说,“尊德性”所内蕴的形上哲思之“学”与道德形下践履之“用”,以及“道问学”所包含的考订求真之“实”,这其中的治学方法论与目的论的内容,时至今日仍然焕发着勃勃生机,影响并制约着当今学界的整体姿态与走向。因此,就“学风建设”的重要性而言,在传统学术中无有重于要于“尊德性”和“道问学”者。清代“道问学”学风的形成与确立反映了传统学术思想由理学而清学转轨的内在要求,而两种学风之间的转变当以清初为“时代枢纽”。“鉴古可以知今”,通过清初孟学研究的再梳理,洞晓其间由“尊德性”而“道问学”演化之因缘,正可由彼及此地顺流而下,窥及近三百年来学风整体走向的内在原因。

清代学术的一大特色是诸子学的兴起,其中又以孟、荀思想研究所蕴含的时代内涵最为丰富。清初和晚清是清代诸子学发展的两个高峰期,晚清诸子学的兴盛学界多有著述,但关于清初诸子学,尤其是孟、荀思想研究与学风转轨之间丰富而

复杂的联系却尚未得到充分关注。略览清代孟学、荀学的梗概就不难发现：清代孟学与荀学之间存在一个“此”消“彼”长的呈现模式，而孟子主“尊德性”，荀子则重“道问学”，^①以此，清初学界便隐然显现出荀子的“升格”与孟子的“降格”运动，此正暗合着宋明学风到清代学风转轨的特色，恰与唐至宋明间孟子的“升格”与荀子的“降格”成一显著的对比。同时，由于孟子在经、子之间地位——“由子升经”、“由经归子”——的变化，致使清初孟学中的诸多问题和表现正可用来解释清初学风由“尊德性”到“道问学”的转变。

由于孟子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特殊的历史地位和清初学者所处的特殊历史时期，所以对清初孟学研究之再研究具有学术意义和价值。不仅有助于认识学术思想自身的生命运动，并把握其发展脉络，深化学界对清代学术思想特点和清初学风转型的认识；而且也有助于揭示宋明到清代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变化，以及学风转变中蕴含的时代及社会的影响因素。本书在清初学风转轨的视野下，将孟学——并兼及荀学——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和剖析清初孟学研究学风由“尊德性”而“道问学”转变的内在联系。

首先，探究清初孟学的趋势和演变是深化清代学术思想研究的需要。清初孟学研究表现出不同于宋明时期的突出特点，虽然研究对象的内容在清初并没有发生变化，而清初诸儒视野中的孟子却是一副“道问学”的模样，这对孟子思想的原始义来说是一种主体性诠释甚或是一种“曲解”和“误读”。但正是对孟子思想的此种诠释折射出非常独特的时代内涵，并成为清初学风由“尊德性”而“道问学”转型的佐证之一。

其次，清代“道问学”学风的形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就学风研究而论，学界往往着眼于学风表现的典型性，重视对业已成形的学风进行研究和分析，此时学风的各种特征明显，易于把握，故此种研究方法有其简便性与合理性。然而，这种研究取向容易忽视对学风转变过程的细致把握。过程制约结果。如果仅从业已成形的学风“上溯性”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就难免将历史的“已然”当作“必然”，将丰富而复杂的思想简单化。基于此识，本书将注重学风转轨时期学术思想的发展和变化，试图弥补传统学风研究在“过程性”研究方面的缺憾，并将孟学研究作为传统学风研究之新视域、新侧面，发现其中内隐的学术趋向。重视学风的“过程性”研究，不

^① “像战国时期的儒家孟子，便偏重在尊德性方面；荀子偏重在道问学方面。汉代学者多半是走荀子的路，宋代学者多半是走孟子的路。而宋代学者之中，朱熹偏重在道问学方面，陆九渊偏重在尊德性方面。于是两千年间所谓‘孟荀是非’、‘汉宋门户’、‘朱陆异同’，成了长期封建社会中学术思想界斗争的一个主要内容。”参见张舜徽：《张舜徽集·清儒学记》，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1—262页。

但是对传统学风研究的一个补充,同时也是进一步深化学风研究、深化学术流变研究的理论需要。

第三,以孟学研究为切入点探讨清初学风由“尊德性”而“道问学”的转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清代重要而富有创见的孟学成果基本出现在清初(如黄宗羲的《孟子师说》、王夫之的《读四书大全说·孟子》,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等);清初孟学关注的关键性论题,诸如人性论、情欲论、治学方法论等后来均成为整个清代孟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其思想内容详加剖析。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命题本身即已包含着清初孟学不同于以往孟学的重要特征和趋向;另一方面,清初学者对此类命题的分析,对清初以降的孟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而不容忽视。作为儒家治学方法论,“尊德性”和“道问学”从来没有全然割裂,然下至清初,“道问学”逐渐从传统的作为实现“尊德性”的方法和手段的层面游离出来,具备了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一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与清初学者对“道问学”治学方法的理论探讨和价值重建息息相关。是故,以清初孟学为切入点,对清初学风展开具体而深入的研究,有利于形象地再现清初学风由“尊德性”而“道问学”的转轨过程,感性地体会清代“道问学”学风形成过程中学人所付出的艰辛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从清初孟学切入的研究视角拓展了传统学风研究的范围;重“过程性”的研究取向则希望引起学界对学风研究方法的反思和深入。

第四,清初学风转轨研究还具有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当前世风不古,学风不淳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思考。就学界而言,如何从自身做起,实现学风的自觉转变,培养起“为学术而学术”的求真精神和勇气,实尤为迫切和必要。清初学人在学风转轨过程中表现出的开拓意识、创新胆略以及对治学理念的身体力行,对于我们今天走出学术窘境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清儒在“道问学”学风滋养下培育起来的求真精神和奉献意识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匮乏而亟待补给的。

准此,本书将考察重点集中于如下几方面内容:一、探讨清初孟学研究的学术语境、研究路径与学风趋向。二、就清初孟学研究中的核心论题,如人性论、情欲论等,分析其中所反映出的“道问学”学风倾向。三、考察清初孟学研究中的荀学理路。四、以戴震、焦循的孟学研究展现“道问学”学风的确立与流衍。

关于清初孟学研究的学术语境。清初反思理学运动方兴未艾,实学学风正是在批判宋明儒玄虚空谈,尤其是王学末流的束书不观、坐而论道情形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清初诸儒的孟学研究一反宋明儒只见孟子的性善和良知之论,而着意挖掘孟子思想中的“实学”内容,即一方面将孟子诠释成一个“道问学”的君子,以针砭晚明王学的空疏;另一方面又强调孟子的践履,以批判晚明王学的“狂禅”和以“知”

代“行”。

在以实学为主旨的学风影响下,清初孟学研究表现出两种路径:以子解经,自觉地将孟学降为经学的附庸。孟子在传统儒学中的特殊地位使得孟子思想作为经学研究的附庸而存在,唐宋时期所谓的“孟子升格运动”使孟子由“子”升“经”。清初诸儒在经学渐重的时代氛围中重新研究孟子思想,并把它作为五经思想的补充和证明,这本身就内隐了清初“弃虚蹈实”的时代义理。同时,清初孟学研究又不仅仅局限于从孟子思想中挖掘可以补充考订经学中的字、词、音、义、典制、史实的内容,清儒更不满宋明儒视野中的孟子形象,希望以诠释性语言凸显孟子思想中的实学内容,并借阐释孟子思想来表达自己的治学主张,清初孟学因而显示出的另一研究路径——义理探讨,通过义理阐释表达清初学人对于学风建设的具体意见。本书侧重梳理清初孟学研究中涉及义理探讨的几个问题,意在揭示清初孟学研究由“虚”而“实”,揭示清初学风由“尊德性”而“道问学”的转变轨迹。

由“尊德性”而“道问学”是清初孟学体现出的学风总体趋向。清初学人语境中的“尊德性”、“道问学”分别具有“形上”和“形下”两个层次。主观上,清初学人对于“尊德性”、“道问学”的态度是不偏不倚的,大多数学人认为既要“尊德性”又要“道问学”。但是,客观上,清初学人的“尊德性”已非陆王的“尊德性”,而“道问学”亦非程朱之“道问学”。分析这对概念在清初学界的独特内涵与时代思潮的联系,进而透视新旧学风的转轨何以成为时代的最终选择。

本书以清初孟学研究中的“问题”为出发点,考察不同学人在同一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和观点,并力图凸显出孟学研究中的心性论和情欲论重点。这两个论题的选择根据在于:一、问题的重要性。心性论和情欲论在整个孟学研究中和清代学术思想史中都是具有高度理论性的核心问题。二、问题本身的普遍性。清初学人的孟子研究均涉及心性论和情欲论,对这两个论题进行研究能够揭示清初孟学的普遍倾向。三、问题的典型性。清儒关于心性论和情欲论问题的讨论反映着清初由“尊德性”而“道问学”的学风转变。

关于清初孟学研究中的心性论问题。心性论是孟子思想的根基所在,而心性之学又是陆王学派最重要的内容,清初学人在反思明亡之痛,检讨理学之弊,走向“弃虚蹈实”之研究路径过程中,对心性这样的“虚”论却尤为重视。本书从清初学人对人性善恶的新诠释、清初人性论讨论的两种转变倾向,以及其中折射出的学风特点进行考察和分析。清初诸儒重视“人性”形成的“过程性”,重新诠释人性之善与恶,将人性善理解为人性“向善”、不断完善的过程,而将人性恶的形成与外在环境相联系,重视客观知识在人性善恶形成中的影响作用。目前学界对于清初人性

观的讨论主要局限于对一元论的阐述上,或言“气本论”,或言“理气一元论”,而对人性论问题如何从宋明儒的“二元”转变为清儒的“一元”的曲折过程和深刻原因似分析不足。清初人性论问题的总体趋向之一是由二元性论转变为一元性论,其根本动因就在于清初学风中对“实学”、“实践”、“实行”的追求,这种追求使清初的人性论一别宋明儒理学范式下心性之“虚”论,而转到了紧贴社会生活的“实”的层面。清初人性观讨论的另一重要趋向是,由重视主体道德转变为重视客观知识。这一转变反映出清初人性观受到荀学思想的渗透。清初人性观讨论的转变轨迹正是学风由“尊德性”而“道问学”的转化过程的一个侧影。

关于清初孟学研究中的情欲论问题。情欲是关系人性善恶的关键,也关系着人性二元还是一元的问题。明末清初以来,学界对人之情欲的合理性问题存在一种肯定的趋向,结合清初的实学学风对这种倾向进行分析。清初学界肯定人之情欲有两种表现:一是倾向于以更加严格的道德自律来把握正当情欲;一是重视外在因素对人之情欲的规约作用,即出现了重“礼”的学术现象。本书意在探讨情欲问题的两种表现与清初学界新旧学风转换之间的相关度。清初诸儒从重视自然的角​​度讨论情欲,强调“礼”对人之情欲,乃至现实社会的规范作用,不难发现清儒情欲观中存在着荀学因子。清初情欲观重视“礼”的学术现象,以及这种现象在学风由“尊德性”到“道问学”转变过程中的意义,都是本书探究的重要问题。

以清初孟学研究中的荀学理路为切入点,考察不同学人孟学研究中所隐含着的具有共同性的荀学特征,并探析此种学术现象与“道问学”学风形成之间的关系。清初孟学研究中何以悄然杂以荀学思想?本书将重点考察两方面,一是分析清初孟学研究中的重“学”表现,这种表现和荀子《劝学》思想存在高度的关联性,而此种关联性背后的理据何在?二是探讨清初孟学研究中重“礼”以及其与荀子重“礼”思想的关系。孟子重“良知”,故其言礼阔略粗疏,荀子主“性恶”,故重以礼规范人的社会行为。清初学界之重礼,恰恰是孟子地位发生“下移”,荀子地位“上升”,荀学正在受到学人重视的重要表征。本书通过剖析清初诸儒孟学研究中渗入的荀子思想,揭示清初学术方法的转变、清代新义理观的出现以及孟、荀思想在清代学术地位的变化,印证清初学风由“尊德性”到“道问学”的转变。

最后,以戴震、焦循的孟学研究做结,从戴学精神和戴学方法两个层面来剖析以戴震孟学为标志的“道问学”学风的形成,以及“道问学”学风在孟学研究中的具体表现,揭示戴震后学对其精神的传承和方法论的补充、完善,最终揭示清初孟学研究 with 清初学风转轨之间的相关度。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在清初孟学研究中具有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戴震的重知思想、求实的学术研究方法以及求真的研究精神为乾嘉学人所秉持,其孟学研究开启了晚清乃至近代诸子学研究的复兴之路,重新定位了孟、荀思想在清代学术思想中的地位,并最终确立了“道问学”的治学路径。戴震孟学中对客观知识的尊重、对传统礼制的重视在程瑶田、凌廷堪、崔述等人的相关研究中均有表现,重知思想上表现出的“去道德化”与重礼思想的“制度化”走向是时代赋予的新内涵。戴震“训诂明而后义理出”的治学方法论被焦循在《孟子正义》中实践,而焦循提出的“贯通观”成为时代思潮下对戴学方法论的重要补充。至此,传统学风由宋明之“尊德性”而清之“道问学”的转轨基本完成,清代学风又即将走上新的发展、演变之路。

二、学术史回顾与反思

(一) 清代孟学研究的学术前史

目前,大陆、港台及海外学界还没有从清初孟学研究的视角来考察清初学风转轨的专著,但对清代孟学和清初学风的部分问题已有相关成果。

关于清代孟学研究的专著有:刘瑾辉的《清代〈孟子〉学研究》,^①作者做了大量的文献收集和整理的工作,对于清代孟学专著、专论和序跋类文字一一进行归类、统计和整理。从义理和考据两个方面对清代孟学研究的成就进行以点代面的考察,但对清儒的孟学考据成就评价甚低,认为清儒《孟子》考据研究中“悬案”较多,然其原因“在于清一代误将方法之考据,当成学问之考据”,还认为清之考据未必能冠之以“学”。站在重视义理阐释的角度来评价考据学,却没能注意到清代考据学的义理内涵,以及考据学对于学风培养的影响和意义。赵庆伟的博士学位论文:《清代孟学研究》,^②作者从梳理历史文献的角度对清代孟学从训诂考据和义理阐释两个方面进行考察,重点就清代孟学义理阐释方面的著述展开研究,涉及黄宗羲、王夫之、戴震、焦循、阮元、康有为的孟学研究。该论文从文献学和思想史的角度考察清儒的孟学研究,但对清代学风、学术思潮与学人思想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清代学人对孟子思想的解释何以出现变化的原因没有深入探讨。在解释清初思想对乾嘉考据学的影响时作者认为,清初反理学思潮中的法古倾向是乾嘉学派形成在

^① 刘瑾辉:《清代〈孟子〉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② 赵庆伟:《清代孟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

理论思维上的内在逻辑依据。^①然而,将法古倾向作为乾嘉学派形成的理论和逻辑依据似说服力不强,也无从解释乾嘉学派何以取得斐然的学术成果,以及如何培养起求真的学术精神。因此,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清代孟学还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

涉及清代孟学研究的专门章节有:董洪利的《孟子研究》,^②以学术上的反理学和政治上的高压解释清代朴学学风的形成,认为清代孟学研究的变化趋势也是由空说义理变为训诂考据为主,所以对清代孟学主要是从训诂考据的角度展开研究,而对清代孟学研究的义理内涵注意不够。张立文主编的《中国学术通史·清代卷》引用王国维论清代学术之语,就清代孟学研究的特点进行总结。^③台湾学者黄俊杰《中国孟学诠释史论》^④涉及黄宗羲、戴震和康有为的孟学研究。其他还有,杨泽波的《孟子与中国文化》、^⑤台湾学者李明辉的《孟子重探》、^⑥刘仲华的《清代诸子学研究》。^⑦另外,涉及清代孟学研究的学术论文主要有:赵庆伟《孟学的演进及其时代特色》、刘瑾辉《清代孟子考据学综论》、卢仁龙《清代诸子学史述略》、魏宗禹《明清时期诸子学研究简论》。^⑧这些研究或对孟子思想进行了梳理,或对清代子学研究有概况性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孟子思想,理解清代孟学研究的整体状况。然而,这些研究都没有把清代孟学,尤其是清初孟学放在学风由宋明而清的转轨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因此也就对清初孟学研究的内涵和意义重视不足。

关于清初学风的研究:清代学术史中兼有开创之功和经典研究的两部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⑨认为清初学人的治学目的从属于政治,或曰经世目的,所以清初是反理学的“经世致用”学风,而这种学

① 陈祖武早有这样的认识。还有学者认为回归经学原典的学术趋向,表明清初学术研究正在向实证和理性的方面转移,这在客观上为乾嘉考据学的兴起和发展,做了必要的准备。此识较为公允。参见许道勋、徐洪兴:《经学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页。

② 董洪利:《孟子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③ 认为清初孙奇逢、李颙、黄宗羲、王夫之、戴震等人之孟学大,阎若璩、焦循、周广业、翟灏等人之孟学精,庄存与、刘逢禄、康有为等人之孟学新。参见张立文主编:《中国学术通史·清代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0页。

④ 黄俊杰:《中国孟学诠释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⑤ 杨泽波:《孟子与中国文化》,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⑥ 李明辉:《孟子重探》,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版。

⑦ 刘仲华:《清代诸子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⑧ 赵庆伟:《孟学的演进及其时代特色》,《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刘瑾辉:《清代孟子考据学综论》,《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卢仁龙:《清代诸子学史述略》,《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3期;魏宗禹:《明清时期诸子学研究简论》,《孔子研究》1998年第3期。

⑨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风在清廷政权稳定以及学界经历了屡次文字狱之后发生转变,走上健实有条理的考据之路。也就是说,梁启超注重从学术“变革”的角度分析学风,勾勒出清代学术史的新特点、新趋势。然而,任何“新”都不可能完全脱离“旧”的影响,学术思想的发展尤其如此。梁氏忽略了学术思想继承的一面,深入分析理学学风与清初学风的关系,以及清初学风与乾嘉考据学派形成之间的内在学术联系,没有注意到清初学风中胎育的“道问学”倾向,这一缺憾在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得以弥补。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①注重从学术思想“继承”的视角来分析清代学风,尤其是清初学风与晚明东林学派乃至宋明理学的关系,认为清初实学学风是东林学派遗风的承续。钱氏弟子余英时继承并发展了这种观点,注重从学术发展的内因去解释学术现象,余英时的一系列研究具有典范价值,^②“内在理路”说更是他学术研究的重要创获。余氏对宋明理学向清代考据学转变的原因提出了新的解释,即用学术思想的“内在理路”来解释“尊德性”到“道问学”的转变。突出清儒对知识传统的认识 and 贡献,认为清儒尤其是乾嘉学者对“道问学”传统的贡献不能忽视。2000年前后,余英时对“尊德性”、“道问学”的认识又有进一步深化。^③但是,为了证明从晚明到清初“道问学”压倒“尊德性”,余氏认为“尊德性”具有“反智识主义”的倾向,不利于当今社会的发展。路新生指出,“尊德性”和“道问学”是儒学发展的两个传统,均具有相当的认识论意义,没有高下先后之分。“尊德性”就是“道问学”,“道问学”就是“尊德性”。^④另,余英时将考察由“尊德性”转向“道问学”的重点放在清中期,对于清初着墨不多。本书则试图把视野向清初推进,因为将“尊德性”的形下践履层面的意义挖空,而填充上“道问学”层面的知识论内容的倾向,其实早在清初学者中就有所表现。同时,余英时没有从清代诸子学发展的角度,尤其是没有注意到清初孟学发展中蕴涵的“尊德性”和“道问学”关系的变化。因此有必要从清初孟学研究的视角深入挖掘新旧学风转换的意义。

国内学界对于清初学风的研究:较早的有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⑤此论文写于1963年,后收入同名论文集。文章借论顾炎武的学术特点勾勒出明末清初的学风,从社会大背景、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以及政治处境来分析明末清初学风形成

①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②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台北,龙门书店有限公司1976年版;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

③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2000年再版序言。

④ 路新生:《“尊德性”还是“道问学”——以学术本体为视角》,《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⑤ 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的原因,有助于我们整体把握清初的学术环境和背景。但没有从学术思想的层面考察学风形成的原因,没有从学术思想发展的内因出发去探寻是文章的一大缺憾。20世纪80年代,王俊义将乾嘉考据学的产生和兴盛与康乾盛世联系起来,^①认为将文字狱视为乾嘉汉学产生原因的看法有失简单和偏颇。从90年代起,国内学界开始注意从学术自身的发展来探讨学风转变的原因。陈祖武《从清初的批判理学思潮看乾嘉学派的形成》^②一文,不满从清初文字狱和康乾盛世政治的角度解释乾嘉学派的形成,而试图从儒学自身发展去寻找原因。通过对清初批判理学思潮的研讨,试图说明理学向考据学转化的历史必然性。认为批判理学思潮中的复古倾向,导致清初知识界在方法论上逐渐摒弃宋明理学的哲学思辨,走向了朴实考经证史的途径,从而为乾嘉学派的形成在理论思维上提供了内在的逻辑依据,认为乾嘉学派的形成是清初批判理学思潮蜕变的直接结果。陈祖武对清初学术给予了相当的重视,把清初学术视为宋明理学向乾嘉汉学转换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而他对乾嘉考据学却评价不高,认为经学的复兴是历史的“迂回”和教训。

公允地说,乾嘉考据学派有自己的治学方法和原则,有所秉持的学术价值观,对经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功莫大焉,就其学术成绩而言,乾嘉考据被称之为“学”,当之无愧。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对清初学风转变的探讨也才更有意义。路新生从探寻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内在原因出发,探求援佛入儒和儒释之争对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为乾嘉学派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视域。^③此外,相关论文还有,李海生《社会批判思潮与明末清初的学术转变》、^④史革新《清初学术思潮转换刍议》。^⑤在谈及清初学风转变的原因时,他们或认为清初的理学批判是由宋明理学向清代朴学转轨的最直接的内在动力;或把清初学术思潮的转换具体化为理学的“由王返朱”、经学的“由宋返汉”、诸子学兴起体现的“由经返子”、经世致用思潮流行展现“由虚返实”、西学传播昭示“以中纳西”。

学界基本认同清初学术思想在传统思想转变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但分析切入点及其结论却言人人殊。有学者从清初实学与西学的关系入手分析,揭示清初思想的变迁,认为戴震“穷理致知”的方法是吸收西学而来。^⑥有学者不满足于用“尊德

① 参见王俊义:《乾嘉学派的成因及其评价》,《人民日报》1982年10月25日;《康乾盛世与乾嘉学派》,《清史研究集》第四辑,1986年版。

② 参见陈祖武:《清初学术思辨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③ 参见路新生:《排拒佛释:乾嘉考据学风形成的一个新视角》,《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④ 李海生:《社会批判思潮与明末清初的学术转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⑤ 史革新:《清初学术思潮转换刍议》,《四川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⑥ 参见张西平:《西学与清初思想的变迁》,《现代哲学》2007年第4期。

性”、“道问学”的转换来解释宋明理学和清代学术之间的关系,提出经世致用观念是宋明理学和清代学术思想的生命所在。^①总之,就现阶段所掌握的研究现状而言,目前学界还没有公开出版的从清初孟学研究来探讨清初学风在“尊德性”、“道问学”之间转轨的专著,有的只是部分章节涉及这一主题。因此这一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值得进行深入研究。

(二) 反思

思想史研究一般注重对思想家及其著作本身的考察和分析,尤其是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常常出现忽视思想产生的时代和社会环境的现象,导致思想史研究出现“就思想而论思想”的倾向。随之就产生一个问题:无论是对思想家还是其著作的研究常以孤立的个案出现,缺乏对同一时代环境下思想家群体的共性以及这些共性所反映的深层次因素的研究。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想与前一时代学术思想之间的“异”、“同”都是此一时代的“辨识度”。“同”反映着思想的承继和延续,而“异”则是思想转折、社会发展的表现,“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便是考察某一时代思想文化发展、演变路径中尤当致力之处。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侯外庐就曾说他思想史研究“始终注意社会史和思想史的关联,……论述古代思想的发展,始终扣紧古代社会的发展”。认为在思想史研究中应该注意“社会历史阶段的演进与思想史阶段的演进,存在着什么关系”。^②西方学者也提出“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注重将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研究融于一体。^③

学风研究作为学术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需要对学术范式的历史形态的演变,以及学术研究方法论的发展、更新展开分析,学风研究应该是动态的、注重过程性、整体性的研究,因此,有必要将时代学风与社会思潮密切联系,注重学风与学术思想直接相关的学术理念、治学方法等。以学风研究为切入点,建构学术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和时代关切,以补传统学术思想史个案研究之不足。在学风研究视域中,分析同一时代、同一问题上不同学人在思想主张和学风倾向上的共性特征,从“同中之异”寻找“异中之同”,揭示时代学风、社会思潮与学术思想发展趋势之间的内在联系,凸显时代和社会因素对思想家及其思想的影响和作用。

① 参见孙勇才:《内在理路:从尊德性到道问学——余英时与清代学术思想研究》,《安徽史学》2008年第1期。

② 侯外庐:《韧的追求》,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67—268页。

③ Benjamin A.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4.

基于以上认识,本书将思想史研究与学风研究相结合,通过考察同一时期多个思想家及其著作,分析他们学术主张和学风倾向上的一些共性特征,揭示这些特征与时代环境和学术发展趋势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凸显时代和社会因素对思想家及其思想的影响和作用。

清代学风与宋明学风的差异已是学界共识,乾嘉考证派学人重“道问学”是清代学风的典型代表和集中体现。本书将考察重点放在清初“道问学”学风的形成过程,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风起于青萍之末”,“前考证时期”的思想倾向更能透露出时代环境的制约性影响怎样推动学术思想的悄然转变,从而更易于把握学风发展的脉络。二、“过程研究”能够凸显学风形成、发展中各种因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影响和作用,有助于克服学风研究中的臆断倾向。

第一章 反思理学与清初孟学研究

清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承袭着明末悄然兴起的反思理学运动,其学风出现了深刻变化。自龚自珍言清代学术实为“道问学”^①之后,“道问学”传统在清代的确立就被视为传统学术思想向近代转型的“始点”,^②而清代学术思想的近代性正是“道问学”传统培育起来的怀疑精神、求真态度以及对知识的尊重。^③当我们把研究触角继续前伸就会发现,清初学术思想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向“前近代”^④学术转型的重要环节。^⑤换言之,清代学术思想所蕴涵的近代学术思想因子在清初已见其胚芽。

清初孟学最初从属于“四书”学的研究范畴。^⑥“四书”是理学价值体系和践履理论的基本依据,故理学家重“四书”,而清初诸儒围绕“四书”展开对宋明理学的批判运动成为反思理学的“主战场”。《孟子》在唐宋年间实现“由子入经”的

① “孔门之道,尊德性,道问学,二大端而已矣。二端之初,不相非而相用,祈同所归;识其初,又总其归,代不数人,或数代一人,其余则规世运为法。入我朝,儒术博矣,然其运实为道问学。”参见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193 页。

② “如果我们对儒学采取一种广阔而动态的看法,则有清一代的‘道问学’传统正可以代表儒学发展的最新面貌。尤其重要的是这个新的发展恰好为儒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提供了一个始点。”参见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北京,三联书店 2000 年版,原版自序。

③ 有学者认为,清初诸儒的学术特色就在于“怀疑态度,求真精神,与致用思想”。参见何格恩:《戴东原的哲学及伦理思想》,载《南大戊辰哲学论文集》,岭南大学哲学研究委员会 1928 年版,第 58 页。又有研究者认为,清代思想的进步性在于思维方式的变化。参见王茂、蒋国保、余秉颐、陶清:《清代哲学》,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9 页。

④ 在沟口雄三的“前近代”概念中,“近代”是采用世界史分期中常识性的概念,中国的“前近代时期”,从思想史角度看,是以阳明学的兴起为上限,以太平天国前后为下限,而明末清初是“分水岭”,出现了“一系列质变的征兆”。参见沟口雄三著,索介然、龚颖译:《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所谓东林派人士的思想——前近代时期中国思想的发展变化》,北京,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367—368 页。

⑤ “乾嘉学术,是中国传统学术从注重伦理道德向重视知识转变、从包罗万象的道统向分门别类的具体科学转变的一大枢机。”参见许苏民:《乾嘉学术中的知性精神——戴震、章学诚思想片论》,载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编:《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48 页。又,“如果说乾嘉汉学是中国古代学术通向近代学术的桥梁,那么清初学术则是由宋明理学向乾嘉汉学转换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参见陈祖武:《清初学术思辨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99 页。本书所指之“清初”下限到乾隆年间。

⑥ 笔者认为,清初孟学研究最初是作为清初“四书”学的研究内容,之后伴随着时代要求和研究的深入,清初学人对孟子思想有了不同于宋明理学的认识,孟学研究出现了独立于“四书”研究之外的倾向,直到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出,孟子学具有了独立的研究意义。